

《東華漢學》第 28 期；145-18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8 年 12 月

## 人巧合天工，新物勝舊物 ——論清代〈自鳴鐘賦〉西方新物之書寫模式\*

游勝輝\*\*

### 【摘要】

舊文體承載傳統的感知與書寫模式，面對來自異國，且背後思維大異中國的西方新事物，將如何運用傳統書寫模式予以表現？尤其是對於以類聚各種名物典實為尚的詠物賦，更是一大挑戰。本文以清代與朝堂、考試密切相關的〈自鳴鐘賦〉為例加以探討，發現：（一）諸賦往往將自鳴鐘運作的機械之「人巧」轉化為代表中國傳統天道觀的「天工」，並引用種種相關陰陽氣化、聯類感應的知識、典故。（二）諸賦皆稱頌來自西方的自鳴鐘遠勝中國傳統計時器，但又將其與後者的發展歷史聯繫起來，彷彿一脈相承，這點依然出自於以古鑑今的傳統時間觀，似乎也因此解除了對於異國的焦慮。由此具體可見，舊文體試圖運

---

\* 感謝三名匿名審查人給予本文的審查意見，使本文更趨完善，筆者已盡可能按照審查意見予以修正。本文初稿完成於臺大中文研究所 2015 年開設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專題」課程，受惠於鄭毓瑜、楊芳燕、高嘉謙等授課教師的提點。又，撰寫論文過程中，承蒙劉怡伶老師提供會議論文，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用舊的感知、類聚、書寫模式伸縮適應新的事物，既有殊異的趣味，也有最終力有未逮的地方。

**關鍵詞：**清代、西方、自鳴鐘、辭賦、新事物

## 一、前言

「自鳴鐘」，是明清時期中國對歐洲傳來的機械鐘的稱呼。之前的計時裝置，如日晷、漏壺、沙漏、炷香等，多少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約於十四世紀出現的機械鐘，才使統一的計時標準成為可能。<sup>1</sup>明代萬曆十年（1582），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到廣州傳教，意外開啟自鳴鐘在中國的歷史，以及新的時間意識的傳入。<sup>2</sup>歷史學界對此一議題探討頗多，如李侑儒《明清的鐘表（1582-1911）》討論晚明至清末鐘表的流傳、製造、相關的正反論述，與時間觀念的改變；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中也探討了自鳴鐘、時辰表進入中國後，一種「脫離了具體日常生活的暗示，而以分針秒針的機械規律運動循環往復地呈現」的時間觀開始落地生根。<sup>3</sup>

事實上，明末至清代，自鳴鐘常常作為西洋器物的代名詞，既有不少筆記、議論、報章等相對客觀、核實的文字記錄其流傳、形制，更有許多古典詩賦以之為歌詠對象<sup>4</sup>，上舉二人著作便引用諸多不同文體的材料作為引證文獻。然而，不同的文體傳統，是否介入了理解、詮釋與表

<sup>1</sup> 參見羅伯特·列文（Robert Levine）著，范東生、許俊農等譯，《時間地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第三章，頁 83；吳國盛，〈技術時代：測度時間與線性時間觀〉，《時間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第五章，頁 105-115。

<sup>2</sup> 自鳴鐘引進中國的過程，可參照李侑儒，《明清的鐘錶（1582-1911）》（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第一章，頁 9-38。按照其考察，自鳴鐘最早是由羅明堅於西元 1582 年帶進中國，不過各篇〈自鳴鐘賦〉都以利瑪竇為代表，可見其名更具代表性。

<sup>3</sup> 湛曉白，〈近代計時器的更新與時間計量的變化〉，《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三章，頁 100-145，引文見頁 127。

<sup>4</sup> 參見廖肇亨，〈清代中葉詩歌之世界圖像探析〉，《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頁 300。

達，同一事物的再現因此展露不同風貌？對於外來事物，基於長期書寫傳統事物而形成的詩賦書寫模式將會如何轉譯、吸納？由於兩著出於歷史學的視角，意在考察器物的流傳與觀念的轉移，對此一議題便未加注意。

從詩的角度專文論之者，僅見劉怡伶〈《申報》所載竹枝詞中的現代性體驗——以「自鳴鐘」題材為例〉探討《申報》（1872-1949）書寫自鳴鐘的竹枝詞呈現的新器物觀、時間觀與生活風氣。然而，該文傾向於視竹枝詞為反映現代性體驗的工具，未就此一文體本身多作探討。<sup>5</sup>至於與詩一樣歷史悠長，至清代依然興盛不絕的辭賦，以其為視角探討〈自鳴鐘賦〉的相關論著也極少。<sup>6</sup>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雖已指出清賦的時代特徵之一在於以詠物賦書寫新素材，例證之一包括納蘭性德〈自鳴鐘賦〉，對其書寫模式也未有深論。<sup>7</sup>

實際上，檢索馬積高主編的《歷代辭賦總匯》<sup>8</sup>，〈自鳴鐘賦〉便有七篇，作者如下：納蘭性德（1655-1685）<sup>9</sup>、汪廷珍（1757-1827）<sup>10</sup>、

<sup>5</sup> 劉怡伶，〈《申報》所載竹枝詞中的現代性體驗——以「自鳴鐘」題材為例〉，《國際圖書館東亞文獻合作暨華文報刊數位化研討會學術論文集》（長沙：湖南長沙人民政府、中國研究圖書館員學會（北美）、歐洲漢學圖書館員協會、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東亞部、青蘋果數據中心等合辦，2010），頁 290-298。

<sup>6</sup> 筆者寓目所及，僅見別廷峰簡略分析了此篇辭賦的創作背景。參見別廷峰，〈歌頌進步 意寓改革——讀納蘭性德的《自鳴鐘賦》〉，《承德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四期（1989），頁 83-86。

<sup>7</sup> 參見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第八章，頁 766-767、861。

<sup>8</sup> 按：清代尚有書寫時辰表的辭賦，如鄒志初、顧潮〈時辰表賦〉、水嘉璜〈洋表賦〉，不過因為篇數較少，且內容大抵在〈自鳴鐘賦〉中都有體現，又不比〈自鳴鐘賦〉多了「鐘」的典故可以調動，故選擇〈自鳴鐘賦〉探討。

<sup>9</sup> 清·納蘭性德，〈自鳴鐘賦〉，馬積高主編：《歷代辭賦總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第十冊，頁 9520-9521，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康熙刻本《通志堂集》卷一。

<sup>10</sup> 清·汪廷珍，〈自鳴鐘賦〉（以「鼓名記里車號指南」為韻），馬積高主編：《歷代辭賦總彙》第十四冊，頁 12865，據《律賦類纂體物二》。按：《歷代辭賦總匯》又於姚文然（1620-1678）名下收同一賦作（第十冊，頁 9086），曰據清光緒刻本《實事求是齋遺藁》卷四，然而《實事求是齋遺

胡長齡（1758-1814）<sup>11</sup>、劉鳳誥（1761-1830）<sup>12</sup>、郎葆辰（1763-1839）<sup>13</sup>、胡積城（1821年舉人）<sup>14</sup>、王廣焱（1889年童生）<sup>15</sup>。這些辭賦的作者與創作時間橫跨清初至清末。納蘭性德之作，從內容可見與康熙採用西曆，欽天儀象皆使用西方儀器有關。<sup>16</sup>其他諸作則均是與科舉考試密切相關的律賦<sup>17</sup>，例如胡長齡、汪廷珍、劉鳳誥等作應是三人同時翰林館課之作；<sup>18</sup>郎葆辰也曾入翰林院<sup>19</sup>，其文集《桃花山館吟稿》留有一定數

藁》為汪廷珍之著，其他署為姚之賦作皆實皆為汪作，經查姚文然《姚端恪公文集》也無此賦，可見應是不慎編誤。故本文另據汪廷珍，《實事求是齋遺藁》，《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四百五十冊，卷四，頁495，據清光緒八年刻本。

- 11 清·胡長齡，〈自鳴鐘賦〉（以「鼓名記里車號指南」為韻），馬積高主編，《歷代辭賦總匯》第十四冊，頁12835-12836。據清嘉慶三年刊本《三餘堂館刻偶存》。
- 12 清·劉鳳誥，〈自鳴鐘賦〉（以「鼓名記里車號指南」為韻），馬積高主編，《歷代辭賦總匯》第十四冊，頁12869-12870，據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存悔齋外集》。
- 13 清·郎葆辰，〈自鳴鐘賦〉（以「圓機自轉應時則鳴」為韻），馬積高主編，《歷代辭賦總彙》第十四冊，頁13639。據道光十年刻本《桃花山館吟稿》。
- 14 清·胡積城，〈自鳴鐘賦〉（以「一日思君十二時」為韻）馬積高主編，《歷代辭賦總匯》第十六冊，頁16289-16290。據清刻本《瑞硯齋賦鈔》。
- 15 清·胡積城，〈自鳴鐘賦〉（以「中設機關不擊自鳴」為韻）馬積高主編，《歷代辭賦總彙》第二十一冊，頁21353-21324。據民國手抄本《復廬賦集》。王廣焱生平不詳，此集收入林慶彰主編：《民國文集叢刊》第一編（臺中：文听閣圖書，2008），第一百二十九冊，頁123-126。
- 16 納蘭性德〈自鳴鐘賦〉撰作的背景是康熙十三年（1674）時任欽天監的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所用儀象均依西法新造，漏刻也改成自鳴鐘，故賦有曰：「帝乃命以欽天。紀官司于鳳鳥；易刻漏以茲鐘，建靈臺于雲表。顯列眾辰之圖，深藏運機之奧。」參見趙秀亭、馮統一，〈納蘭性德行年錄〉，《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二十卷第四期（2000.11），頁15。
- 17 參見詹杭倫，〈清代律賦對科舉考試的黏附與偏離〉，《清代賦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第六章，頁239-251。
- 18 三人為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前三名，同時入翰林院，並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同時赴翰詹大考。三人的〈自鳴鐘賦〉皆以「鼓名記里車號指南」為韻。由於清代翰林院時有課賦，胡長齡之作即收於其《三餘堂館課偶存》中，可見三人之〈自鳴鐘賦〉應為同時館課之作。參見王煒編校，《〈清實錄〉科舉史料匯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頁558。
- 19 其於嘉慶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17-1819）為翰林院庶吉士，嘉慶二十四年至道光四年（1824）任翰林院編修，參見《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臺北：

量的辭賦，因而其〈自鳴鐘賦〉也可能是翰林館課之作。<sup>20</sup>翰林館課賦一向是賦選熱門選目，為舉人士子奉習，影響廣泛。<sup>21</sup>路德（1785-1851）《關中詩賦課注》就提到：「前人館課賦，有以『眼鏡』、『鼻煙壺』、『自鳴鐘』諸物為題者，此豈有專門典故乎？難道遇此等題，便無切題之法乎？」<sup>22</sup>可見〈自鳴鐘賦〉之首要讀者若非帝王便是考官，關係政教頗深，對作者而言，如何切題而達到目的，自是重要議題。

如何看待舊文體與新事物之相遇、對話，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一書給予很好的方法論提示。該書意在探討所謂「文學傳統」的背後，實際上牽涉了一套「引譬連類」的意義認定體系與感知模式，在當中，不同門類的情與物、詞與物、物與物間得以彼此對應、推展。該書中〈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一文便以晚清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為例，所探討的不再是舊詩體中出現了哪些新事物，而是理解晚清詩人如何運用舊詩體之字詞與典故去命名、連結與理解新世界與新事物，當中雖不免會有扞格衝突、詞難達意之處，卻正是在新舊依違之間，發現那舊的感知模式與時推移的痕跡。<sup>23</sup>以此研究自鳴鐘相關詩賦，當能進一步深探這些詩賦如何書寫，從中映射出背後日用而不知的書寫模式。

---

華聯出版社，1964），卷三百三十，頁 4857、卷三百五十七，頁 5243。

<sup>20</sup> 關於清代翰林院與辭賦書寫的關係，可參見潘務正，〈法式善《同館賦鈔》與清代翰林院律賦考試〉，《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四期（2006），頁 100-107。

<sup>21</sup> 參見俞士玲，〈論清代科舉中辭賦的地位與作用〉，《學術月刊》第三期（2000），頁 79-81。按：清代賦選收錄〈自鳴鐘賦〉者，筆者寓目所及，如《律賦選青》選錄汪廷珍〈自鳴鐘賦〉，《賦海大觀》選錄汪廷珍（摘句）、胡積城（未題姓名）、郎葆辰（誤作即葆辰）。又如王廣焱《復廬賦集》自署「古學童生」，可見當中所收的〈自鳴鐘賦〉大概即是童生試賦模擬之作。參見清·任聘三纂注，《律賦律青詳註》（道光元年合新堂藏板），卷四，頁 4-6；清·鴻寶齋主人：《賦海大觀》（北京：北京圖書館，2007），頁 158-159。

<sup>22</sup> 轉引自詹杭倫，〈杜甫詩與清代書院賦試題〉，《杜甫研究學刊》第七十一期（2002），頁 94。

<sup>23</sup> 參見鄭毓瑜，〈舊詩語與新事物〉，《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第六章，頁 268-324。又可參見鄭毓瑜，〈博物連類與博覽會〉，《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第一章，頁 53-92。

本文最終選擇〈自鳴鐘賦〉而非相關自鳴鐘的詩歌為主要研究對象，除了書寫新事物之賦更被忽視，以及在論文有限篇幅內力求聚焦外，就文體傳統而言，誠如劉熙載所說：「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斯於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sup>24</sup>相對於詩，辭賦更常透過同類相從、相應的類聚名物知識，加以鋪陳、展開全面而細緻的描寫，可謂引譬連類思維具體而微的呈現。<sup>25</sup>另外，辭賦的發展過程中本以詠物為大宗<sup>26</sup>，魏晉以降詠物賦更蔚為大觀。<sup>27</sup>東漢、六朝以降，辭賦開始用典示學，除了自然知識的推類，更增添了人文歷史的聯想空間。<sup>28</sup>如前引路德所說，如何書寫未有「專門典故」的異方殊物，並將之納入熟悉的物類秩序與價值順位，賦相對於詩，箇中同異對話的挑戰性與研究價值應當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此研究辭賦的視角，梁淑媛首開其例，如其〈飛向星星的你——一個跨文化科幻賦作〈輕氣球賦〉的遊樂園意涵考察〉考察〈輕氣球賦〉如何使辭賦從尊榮帝王的歌功頌德轉為常民生活的熱鬧歡悅，交織報紙報導與傳統神話，文中借鏡上述鄭毓瑜的論述，已明白聚焦在辭賦如何運用典故與過去上手的

<sup>24</sup> 清·劉熙載，《賦概》，《藝概》（臺北：華正書局，1988），卷三，頁86。

<sup>25</sup> 在〈替代與類推〉一文中，鄭毓瑜便將班固、揚雄論賦之推類而言，與鄒衍、《呂氏春秋》、董仲舒等組合跨類知識的文字合而觀之，指出當中皆是透過反覆將彼此之間未必有邏輯關係的類與類加以聚合、擴增，而成就豐富龐大的知識體系與感知模式。這樣的類聚模式形成了後來蓬勃發展的賦體，從而不同於以語言與意象替換、情物對應為主的詩之比興。鄭毓瑜，〈替代與類推〉，《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第4章，頁206-224。另外，簡宗梧分析古今學者同選歷代辭賦的典律化作品，指出「恢廓聲勢」、「微言諷諭」、「徵材聚事」，等特質在當中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可謂賦體主要的充分條件，當中「恢廓聲勢」、「徵材聚事」即符合鄭毓瑜對於賦體類聚模式的強調。參見簡宗梧，〈賦體之典律作品及其因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六期（2003.5），頁22。

<sup>26</sup> 參見曹明綱，《賦學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19；371-374。

<sup>27</sup> 參見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sup>28</sup> 參見簡宗梧，〈從專業賦家的興衰看漢賦的特性和演化〉，《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225-226；簡宗梧，〈賦的可變基因與其突變——兼論賦體蛻變之分期〉，《逢甲中文學報》第十二期（2006.6），頁11-19。

連類模式轉譯新異的器械，其方法視角頗值得參考。若能再上溯至更早就傳來的自鳴鐘等新異器物，比照當中的異同，更能豐富所謂「新辭賦」的發展脈絡。<sup>29</sup>

這批賦作及其創作者時代橫跨清初至清末，雖有細節差異，由於皆出自政教實用的目的（歌頌或應試），其用字遣詞與使事用典，從負面看是文窘意困、陳陳相因，卻也可見他們慣習的感知模式、知識體系與書寫傳統，並不因時代演變而有巨大差異。<sup>30</sup>由此，更可觀察其背後一致的結構脈絡：面對此一沒有「專門典故」的新事物，賦家將如何運用傳統資源轉化、創變以求切題？將如何傳達對於自鳴鐘的種種觀感、聯想與論述？若在當今看來可能有不盡切題之處，又透露了什麼訊息？根據以上思考，下文將分兩個部分加以討論：

（一）這些辭賦中如何結合自鳴鐘的「人巧」與反映傳統時間觀的「天工」？又如何召喚出歷代相關的連類感應典故比喻以至比附新異的事物？從中體現出時間觀的何種差異？

（二）舊物與新物：自鳴鐘作為來自西方的新異事物，在傳統是否找得到作為理解資源的相應者？稱頌新異與自矜傳統是否會發生衝突？抑或在賦體書寫模式中得到調和？

<sup>29</sup> 梁淑媛，〈飛向星星的你（sic itur ad astra）：一個跨文化賦作〈輕氣球賦〉的遊樂園意涵考察〉，《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八期（2016.9），頁 83-114。另外，梁淑媛近來尚發表〈晚清民「新辭賦」研究：以〈鈔票賦〉為探討的中心〉，亦從相關視角予以探討，可惜至今尚未尋得，不及參考。

<sup>30</sup> 匿名審查人之一指出，本文探討之賦作者橫跨清初至清末，卻只討論相同、相似之處，不免忽視差異。由於限於篇幅與學力，本文的確有意觀照不同時期、作者創作之〈自鳴鐘賦〉中依然十分明顯的相同寫作模式，試圖從書寫新事物中的「不變」來觀照其意義所在，此意義因而並非只限於清代，而是長久以來辭賦文體模式的積澱成果。此種研究取徑，得到呂妙芬論著的啟發。她研究明清之際的儒學轉型，不從著名學者的思想出發，而是廣泛觀察此一時期理學的論域（discourse），從中找到具時代意義的共識或趨勢。雖無法探究個別學者之間的差異性，「不過，不同的研究視角本就各有顯有蔽，所帶領我們觀看的內容也有差異，這並沒有優劣之分。」參見呂妙芬，《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引文見該書〈導論〉，頁 16。



## 二、人巧合天工——〈自鳴鐘賦〉關於測時的書寫

### （一）精準測時體現天道循環

現代與古代社會時間觀的異同，是歷來備受探討的議題。一般認為現代時間觀具有不可逆、自律、均勻可分等特徵，如A. J. 古列維奇（A. J. Gurevich）便認為：「現代社會完全受著矢量時間的支配。」<sup>31</sup>「矢量時間」是從過去到現在、向未來單線延伸的時間，更多相關於測量工具，而遠離具體事件、現象。<sup>32</sup>現代時間觀之所以誕生與發展，機械鐘扮演重大角色。十四世紀開始，歐洲開始大量出現手工藝人與商人，他們較為脫離自然環境的時間，增加更為精準的機械鐘的需求，反之，時鐘也繼續加強這種新的時間感。<sup>33</sup>

相對的，傳統的時間觀趨向循環反覆，並與人的具體感知經驗息息相關。<sup>34</sup>中國傳統的時間觀亦然，誠如唐君毅所指出，中國傳統時間觀的無限並不在於線性的一去不返，而在於日月星辰、四時草木的往而又復，體現了陰陽氣化循環不息的生生之幾。由此可見，時間與時間中的現象（日月運行、動植代謝等等）不即不離。<sup>35</sup>吳國盛也指出，中國傳統「時」的概念傾向於「天時」、「四時」，如天干地支、陰陽五行、氣運等等，很少作為純粹抽象的量度時間被討論。此外，中國思想特別

<sup>31</sup> A. J. 古列維奇（A. J. Gurevich），〈時間：文化史的一個課題〉，收入路易·加迪（Louis Gardet）等著，鄭樂平、胡建平譯，《文化與時間》（臺北：淑馨出版社，1992），頁289。

<sup>32</sup> 路易·加迪等著，鄭樂平、胡建平譯，《文化與時間》，頁285。

<sup>33</sup> 同前註，頁298-302。吳國盛，〈技術時代：測度時間與線性時間觀〉，《時間的觀念》，第五章，頁120。

<sup>34</sup> 路易·加迪等著，鄭樂平、胡建平譯，《文化與時間》，頁288。

<sup>35</sup> 唐君毅，〈中國先哲之自然宇宙觀〉，《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1979），第五章，頁100-101。

強調天人相感相通，因而「天時」是一個由天象、氣象、物候，甚且與人事都相互交感的宇宙場。<sup>36</sup>

清代〈自鳴鐘賦〉既以傳統文體書寫被視作加強現代時間觀的自鳴鐘，是否也會呈現上述的差異呢？有趣的是，當他們要強調自鳴鐘的「自鳴」與精準測時的特性，主導的還是中國傳統陰陽氣化、循環往復的時間觀，凸顯出天工與人巧的合一無縫。過去相關計時器的詠物賦以詠漏刻為大宗，當中多有描寫漏刻昭示陰陽之理的字句。<sup>37</sup>理應為重力推動齒輪彼此連動的自鳴鐘呢？其原理在賦體表達中，似乎與漏刻沒有太大差別，如納蘭性德描寫自鳴鐘的轉動是：「實動儀蒼昊健行之無息，而一準朱輪飛轡之均平。賜<sup>38</sup>谷虞淵，蚤暮不差于累黍；昆吾蒙汜，晝宵罔忒于權衡。」自鳴鐘的自動運轉，準確的應合自強不息的天道，以及日御羲和的行路，彷彿「總由一機軸〔軸〕所自舒卷，若有群鬼神為之鼓盪」，因而他感嘆：「則知為是鐘者，誠默奪造化之工巧，潛移二氣之屈伸。」自鳴鐘之工巧，正在於他彷彿體現了陰陽二氣無聲無息的變化，讓人感嘆造化的神奇。胡積城賦也曰：

嘗觀造物有不息之機，太空有自然之律。或風雷之響訇訇，或山水之音飄逸。聆聲韻之無窮，知運行之如一。化機流於物曲，晷刻堪微；人巧合乎天工，鐘聲自出。……音似隨風鈴鐸，戛擊無人；器同齊政璣衡，流行終日。悠然自動，杳矣堪思，聲隨候轉，響與時移。聽觸鳴之不已，問敲扣之為誰。乍靜乍鳴，不徐不急。此理難窮，其機莫執。

<sup>36</sup> 吳國盛，〈中國傳統時間觀〉，《時間的觀念》，第二章，頁 40-46、55-57。

<sup>37</sup> 如陸機〈漏刻賦〉：「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唐代闕名〈漏賦〉：「信是模範，可為法則。體象陰陽，代為作式。」顏舒〈刻漏賦〉：「原夫陰陽遞運，日月分馳。星紀之輪還或爽，律呂之疏密難知。迨皇王之有作，命壺氏以緝規。爰置水於刻漏，載以火而守之。則晦明之期可準，興寢之候無差。」參見清·陳元龍編，《歷代賦彙》（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影印光緒年間雙梧書屋俞樾校本），卷十三，頁 60。

<sup>38</sup> 「賜」應為「暘」之誤。

自鳴鐘聲與風雷山水之聲，自鳴鐘之運轉與北斗七星的流轉<sup>39</sup>，在此賦中皆可以相提並論。雖是人巧，然而仍合乎無關人為造作的不息之機，含蘊難以窮盡的天理。又如劉鳳誥賦曰：「動而無動，個中消息真奇；精益求精，空際盤旋未已。」汪廷珍賦中也讚嘆自鳴鐘：「屢遷而弗違其度，應候而自識其程。有數存焉，無用以為其用；以時發也，善鳴而假之鳴。斯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進退別其部居，上下循其位次。」在他們看來，自鳴鐘完美的體現「不動」卻「不行而至」，推移之變中實有不變之循環在焉。

機械鐘的出現，伴隨著更為精細的時間分割。以現代人的觀念而言，時鐘往往對應的是小時、分鐘與秒，清代中期的相關記載也多已指出，當時的自鳴鐘已有時、分與秒針。<sup>40</sup>然而，清代〈自鳴鐘賦〉卻都沒有寫到秒，反倒大多從一日推展到一年的周而復始，如胡積城賦：「半時便響，終日敲殘二十四番；一晝為週，期年經遍三百六十。」雖然講的是半時（半時辰）即鳴，一晝走過一圈，卻聯繫上一年有二十四番花信風與一年三百六十日。又如王廣焱賦曰：

運機緘之巧妙，叅消息以靈通。不叩而鳴，紀候則聲兼子午；其機如此，占時而韻徹丁東。……三百六旬之迭運，部位無差；一十二候之周旋。規模盡設。非徐非疾，不數不稀。紀其聲而短長

<sup>39</sup> 典出《尚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玉者；正天文之氣，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五星，即金、木、水、火、土星。孔安國將璣衡視為渾天儀，屈萬里《尚書集釋》引《史記》〈天官書〉與《晉書》〈天文志〉，以為璿璣玉衡乃指北斗七星，甚是。然而於此亦可見天象與觀測天象的儀器在當時人看來亦有可以連類同稱的聯繫。此賦既云「流行終日」，當從後者。此典為〈自鳴鐘賦〉所慣用，意義不一，當視上下文而定。參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十三經注疏本），卷三，頁35；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19。

<sup>40</sup> 參見湛曉白，〈近代計時器的更新與時間計量的變化〉，《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第三章，頁118-119。

不錯，察其度而多寡無違。……候豈誤夫陰晴，自然戛擊；數不移於冬夏，妙有樞機。

依然是將自鳴鐘的不扣自鳴推展到準確的表示一年三百六十日與十二候氣<sup>41</sup>，強調「機緘之巧妙」與自然消息之「樞機」互相應合。郎葆辰賦也有寫到自鳴鐘「纖不誤眇〔秒？〕兮，巨不踰刻」的準確，但更多篇幅是如此書寫：

道則或赤而或黃兮，行則或速而或遲。環則或單而或雙兮，數則或偶而或奇。幹則或柔而或強兮，象則或盈而或虧。律則或陰而或陽兮，器則或覆而或欹。錯綜其數，縱橫參差。心迷目眩，不可盡知。……調玉燭兮時一鳴，正子午兮粹且精，何論晦朔與陰晴。

日的快慢、月的盈虧、律呂的陰陽，與環的單雙、數的奇偶、器的欹覆結合。其中，日行一周為一年，月象的盈虧則構成一個月的規律，皆非一日可盡，因而最後引用「玉燭」<sup>42</sup>之典，即四時之氣相和的狀態，依然是將一日之子午與一年之四時結合在一起。這段的描述，與其說是對應自鳴鐘，似乎更像是展示天體運轉軌跡的渾天儀之類，<sup>43</sup>因此，這段與其說是要精確地描繪、定義自鳴鐘的所指，不如說是從自鳴鐘的形制與功效出發，盡可能的牽引、擴展天道秩序的知識，使之彷彿就是天道運行周而復始的象徵。

## （二）具體形制化為天象隱喻

自鳴鐘具體的形制與運作方式，有清一代皆不乏相關考述，如沈大成（1700-1711）〈西洋測時儀記〉、阮元（1764-1849）〈自鳴鐘說〉、

<sup>41</sup> 此處所指應是候氣之法中對應十二月的十二律，詳下文。

<sup>42</sup> 《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參見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李學勤等編，《爾雅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1），卷六，頁184。

<sup>43</sup> 較早詳細記述自鳴鐘樣貌與原理的沈大成（1700-1775）〈西洋測時儀記〉便以「西洋測時儀」稱之，參見清·沈大成，《學福齋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集部第一千四百二十八冊，卷十，頁25a。

徐朝俊（嘉慶時人）《自鳴鐘表圖說》等皆較為仔細說明自鳴鐘的原理與形制，至遲在清代中期，當時士人應能略知自鳴鐘之運轉模式。<sup>44</sup>賦相對於詩，篇幅較大，又以體物為長，對此應能更加詳盡的加以描繪，諸人〈自鳴鐘賦〉卻多以相關的天文知識、物事相比擬，少直接細部的描寫，可見這是關注文體如何作為傳達器物之中介的關鍵。當中，自鳴鐘的指針與時辰的標誌是賦作注目的對象，如納蘭性德賦：

爾其外之可見者，加尺莖于圖上，儼窺天之玉衡。譬夸父之逐日，莫之推而勇行。辰標上下四刻之初正，刻著一十四分之奇贏。尺每交于一辰之疆界，則內鐘之不可睹者，若為考擊而聞聲。

既以觀察天象之玉衡比喻時針、分針，又詳述時分初、正共四刻，一刻十四分多的數據，<sup>45</sup>顯得較為落實，但同時又並置夸父逐日的神話，以之比擬自動運轉的神秘。胡長齡、郎葆辰則以北斗為喻，各謂：「胸外星羅，針若斗杓之指。」「恍珠斗之指四時，乃左旋而右轉。」面盤上的時辰標誌彷彿星羅棋布，而指針就彷彿歷來視作觀測四時的斗杓般指出正確的時間。<sup>46</sup>劉鳳誥賦亦然：

線原有法，因眊景為左旋；針竝稱神，恰週天而中止。錯訝當空之杵，觸處琅然；儻留未上之弦，難聞鏗爾。單錘試叩，先抽繫日之繩；牡鑰齊開，都應渾天之匱。

<sup>44</sup> 詳見李侑儒，《明清的鐘錶（1582-1911）》，第二章，頁 39-42。

<sup>45</sup> 這裡顯然不是根據利瑪竇改革，康熙九年已告確立的 1 刻 15 分，而是以先秦以來一日百刻制得出的 1 刻 14.4 分，故謂「奇贏」（餘數）。

<sup>46</sup> 參見蔣南華，《中華傳統天文曆術》（長沙：海南出版社，1996），頁 18-20；梅政清：《中國上古天文學之社會文化意涵》（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第一章，頁 50-54。另外，北斗由於過去被視為居天體之中而不動，其他眾星環繞而行，既能以之測算四時，也因其居中而有神聖性，被視為溝通天地，人間統治權力的象徵，故以此喻自鳴鐘，應也有縮合政教與天道，藉以歌頌自鳴鐘的意味，參見林素娟，〈漢代感生神話所傳達的宇宙觀及其在政教上的意義〉，《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八期（2010.4），頁 42-44、50-59。

這次有較直接的寫到時針與鐘擺，以及需上弦才能運作的狀況，但也不忘以考察日影的標竿<sup>47</sup>與表象星辰運行的渾天儀來比喻。「繫日之繩」原為留住時光之意，<sup>48</sup>此處則轉為比喻鐘擺之形，同時也再次聯繫其與日行、時間的關係。至於時鐘運轉的部分，他們多用「蟻磨」為喻，如胡長齡賦：「若蠓更之六轉，迺蟻磨之半餘。」郎葆辰賦：「極鰲山峙，盤蟻風旋。靈算推而不滯，法輪轉而常圓。」王廣焱賦：「針隨蟻磨而常旋」。此喻典出王充《論衡》說明日月之行與天之自轉的關係：「其喻若蟻行於礎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sup>49</sup>在此則比喻時針的轉動，而鐘面之圓似乎也成了日月循環運行的象徵。

正如中世紀的英語「時鐘（clock）」從中世紀的荷蘭語和德語「鐘（bell）」而來，<sup>50</sup>漢語以自鳴鐘翻譯西洋傳來的機械鐘，應當也著重在其按時自鳴，有似中國傳統的撞鐘鳴時，又由於鐘本為樂器，因而〈自鳴鐘賦〉也往往聯繫上與銅鐘、樂律相關的典故。《呂氏春秋》〈古樂〉記載黃帝令伶倫以黃鐘為首，依次生成十二律<sup>51</sup>，搭配四時十二月，「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sup>52</sup>，就將十二律與屬於季節變化的十二月聯繫在一起，黃鐘便有了一年之始的意涵。到了《漢書》〈律曆志〉，

<sup>47</sup> 《周禮》〈考工記·匠人〉：「置槷以縣，眡以景。」鄭玄注：「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眠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參見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八十二，頁3416。

<sup>48</sup> 典出西晉·傅玄〈九曲歌〉：「歲暮景邁時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上冊，晉詩，卷一，頁567。

<sup>49</sup> 東漢·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十一，〈說日〉，頁498。另見《晉書》〈天文志〉蓋天家的說法，參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中華書局，1999），志一，〈天文上〉，頁279。

<sup>50</sup> 參見羅伯特·列文（Robert Levine）著，范東生、許俊農等譯，《時間地圖》，第三章，頁82。

<sup>51</sup> 陳奇猷撰，《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8），卷五，〈古樂〉頁284-285。

<sup>52</sup> 同前註，卷六，〈音律〉，頁325。

更將此一律曆合論的思想發揮到極致。<sup>53</sup>由此又引申出候氣之說：將黃鐘十二律的律管依序排列在密閉的室內，各管覆以蘆葦膜燒成的灰（葭莖）。各月中氣一到，如一年之初之冬至，陽氣始生，相配的黃鐘律管最長，當中葭灰就會飛起。雖然歷代以來候氣之法與實測結果往往難以相合，至清初官方已判為不足採信<sup>54</sup>，由於這已成為熟悉上手的典故，也無礙於賦家以此比附同為測時的自鳴鐘，如胡長齡賦：「根本黃鍾，宛起數於律度衡量。」劉鳳誥賦：「固知陰律協陽，調可翻乎伶管」、郎葆辰賦雖曰「非黃鍾之調六律」，又說：「其聲之感而忽動也，若洞簫之風過；其候之應而將至也，若葭管之灰飛。」皆是透過律曆相通之典故傳達自鳴鐘與節候的相感，完美的協調於中國傳統的循環時間觀，並不在意兩者實際上的巨大差異。

### （三）機械自動化為感應連類

許結曾經指出歷代科技賦中存在神學與科學雜揉的現象，即使科技進步，此一現象仍以一種文化遺存長期留跡於這類賦中。<sup>55</sup>相關於科技器用的自鳴鐘賦亦然。關於鐘的連類典故，有三種很常被使用（一）鯨叩獸鳴；<sup>56</sup>（二）銅山崩，鐘自鳴；<sup>57</sup>（三）豐山霜鐘。<sup>58</sup>這三種典故都有傳統物類彼此感應的神異色彩：

<sup>53</sup> 參見東漢·班固著，《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二十一，〈律曆志第一上〉，頁 965。相關漢代律曆合論的討論，參見章啟群，〈《漢書·律曆志》與秦漢天人思想——以音樂思想為中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期（2012），頁 8-15。

<sup>54</sup> 關於候氣說的內容及其演變史，參見黃一農、張志誠，〈中國傳統候氣說的演進與衰頹〉，《清華學報》新第 23 卷 2 期（1993.6），頁 125-147。

<sup>55</sup> 參見許結，〈論科技賦的創作背景與文化內涵〉，《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00-201。

<sup>56</sup> 出自李善注班固〈東都賦〉引薛綜《〈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為鯨魚鐘。」參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藏版），卷一，頁 32。

故其為聲也，不假鯨魚之象，非由樂人之撞。四序流音于漢殿，奚關銅岫之頽；終年叶韻于豐山，豈盡繁霜之降。（納蘭性德）  
鯨魚未躍，噌吰之響遙傳；虞獸奚存，侈弇之興恍類。……儼同  
霜落空山，秋來如告。（汪廷珍）

進西紅而住舶，鯨吼無驚……異霜降之華鐘，豐山吹到。（劉鳳詒）

鞞鞞兮何緣，春容兮有自。豈是土為銅母，蜀山三日而谷驚；抑亦金屬商音，豐山一聲而霜墜。（郎葆辰）

豈待霜從夜感，動盪無持。（胡積城）

非如碧玉撞來，總藉鯨魚之叩……連番輕遞，聲如應於銅山。（王廣焱）

當中，有的是「豈是」、「非如」，有的是「儼同」、「恍類」，甚至彼此之間對同異關係的判斷完全相反，比如同樣是用豐山霜鐘的典故，汪廷珍、郎葆辰、王廣焱從自鳴的面向觀察，便覺得相像；其他人從終年鳴時的角度來看，便以為相異。然而，重點不在於個別比喻的異同，而是他們都不由自主類聚這些相關氣類感應的典故來觀照自鳴鐘，為其抹上一層神秘的色彩，至於自鳴鐘自鳴背後實際上有跡可循的機械原理，他們卻不置一詞。<sup>59</sup>

<sup>57</sup> 出自《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東方朔傳〉。參見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王記書坊，1984），文學第四，頁241。

<sup>58</sup> 《山海經》〈中山經〉：「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注：「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為也。」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卷五，頁165。

<sup>59</sup> 梁淑媛也以清末〈輕氣球賦〉為例指出：「在運用中國文言語文描述西方科技語言時，轉換的力道薄弱，語意邏輯的表述，也不夠清晰，於是形成『文學性強』而『科學感不足』，不那麼成功的詞句。」當然，賦本身追求的也許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強」，用以朝堂頌美或考場應試的〈自鳴鐘賦〉更是如此。參見梁淑媛，〈飛向星星的你（sic itur ad astra）：一個跨文化賦作〈輕氣球賦〉的遊樂園意涵考察〉，頁95。



綜上所述，清代〈自鳴鐘賦〉都注意到自鳴鐘測時精準的效用，然而他們往往要由用見體，循器體道，將其形制與天象運行連結，將其自鳴與鐘的性質聯繫到種種相關陰陽氣化、聯類感應的知識、典故，使「人巧」能面面俱到符合「天工」。甚至到了晚清的王廣焱，其賦作仍與前人相同，強調自鳴鐘運轉背後氣化流行之「樞機」，不去描寫實際上「機械」是如何咬合、帶動。顯然並非賦體篇幅無法承載，或是橫跨清初至清末的不同作者實際上對於自鳴鐘的理解如出一轍，而是賦體傳統本身就建構了這道車轍，作為新事物的自鳴鐘仍不足以將之完全顛覆，因而使人讀來渾然不覺傳統天文秩序有「天崩地裂」<sup>60</sup>的跡象。

### 三、新物勝舊物？——〈自鳴鐘賦〉對於自鳴鐘的定位

#### （一）西方新物與歷久常新

從上節討論中可以看到，大抵〈自鳴鐘賦〉作者們是用「傳統天道觀之體現」來定位自鳴鐘，若聚焦在自鳴鐘作為一個外來事物的身份上，又會被如何書寫？根據李侑儒的研究成果，綜觀整個清代，以「西學中源論」理解自鳴鐘是主流，尤其是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葉鐘表大量輸入，同時考據學風盛行，因此當時士人多援引古籍記載中與之相似的器具加以考述。以當時較為了解西學的阮元（1764-1849）為例，其〈自鳴鐘說〉一文詳細描述鐘內輪軸如何運轉，並說明當中的「重學」原理，可見有深刻了解，但該文開篇就說：「自鳴鐘來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

<sup>60</sup> 葛兆光指出，明清之際西學開始進入中國，其中的天文儀器與新知漸漸被接受，甚且納為官方曆法，然而在中國道器不離的思路中，西方之「器」背後的思維，與中國聯繫天體觀察、神話想像、哲學思維等的「道」會漸漸發生衝突。參見葛兆光，〈天崩地裂（上）：當中國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學〉，《中國思想史第二卷 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三編第一節，頁336-359。

刻漏。」又說宋代以前就有的鞞彈「即自鳴鐘之製」<sup>61</sup>，很典型的代表了當時對自鳴鐘運轉原理有一定理解，但仍將之納為古已有之的學者論述。晚清大量引進西方新學，有關歐洲製作鐘表的史實才開始逐漸被介紹，同時自鳴鐘也漸漸滲透至民間社會。不過，雖然「西學中源」因西學更加流行而相應的減少，但也因為外國經濟力量日漸侵入，出現排斥洋貨的聲音，當中便也有尋找中國固有器物取而代之，或是自行生產以求進口替代的應對方式，由此可見自鳴鐘所代表的西方器物之到來引發的種種好奇與疑慮。<sup>62</sup>

許結談及科技賦作為彰顯盛世氣象、致用精神的賦體，對於科技發展成就的禮讚往往就是歌頌現實政治，本身也是科學研究成果的積累。<sup>63</sup>其論未提及來自西方的新事物，應用在清代〈自鳴鐘賦〉卻依然適切。可以發現，即使事實上到清代中期，自鳴鐘已經較為普遍，甚且中國亦能自行製造，這些賦作仍大方宣稱自鳴鐘為外來物，甚至不避諱其勝過中國傳統的計時器，而不妄言西學中源。另一方面，因為經常運用曆法、計時器（通常是漏刻）與鐘樂等內涵長久歷史積澱的典故，彷彿自鳴鐘也成了中國器物革新的一環，兩者之間的張力值得注意。

作為〈自鳴鐘賦〉的開創之作，納蘭性德著重將記時的自鳴鐘與作為時間標準的曆法並列書寫，開篇便回顧曆法、樂律與漏壺的歷史：

緬昔二儀肇判，三辰初曦。軒轅制器尚象，伊祁治曆明時。岐伯鑄鐘而調嶰竹，挈壺司漏以協璿璣。用能揆合昏旦之盈縮，平章度數之精微。是以仲叔義和守之百世而勿失。天官太史用之億代而靡違者也。

<sup>61</sup> 清·阮元著，鄧經元點校，《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三集，卷五，頁700-701。按：阮元為胡長齡、汪廷珍、劉鳳誥同年進士，皆入翰林院，然未見其有〈自鳴鐘賦〉傳世，殊為可惜。

<sup>62</sup> 李侑儒，《明清的鐘錶（1582-1911）》，第一章，頁33-37；第二章，69-71。

<sup>63</sup> 參見許結，〈論科技賦的創作背景與文化內涵〉，《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頁201-202。

從天地初開、日月星初明的上古時期，黃帝制漏刻、<sup>64</sup>命伶倫造律為黃鍾、<sup>65</sup>堯命羲和制曆授時，到周代命挈壺氏掌管漏壺，<sup>66</sup>體現計時器與天道運行、天文曆算的密切關連。其後，納蘭性德從自鳴鐘與傳教士任欽天監，以自鳴鐘作為測算器具的角度切入，歌頌康熙恢復一時被廢的西洋曆法的新變：

丕惟聖祖龍興，造邦中字。聰明時憲，風雲應虞。改革制度，釐定規矩。曆授西洋，法依古里。厥初爰有自鳴之鐘，創於利馬豆氏。雖形體之大小多所殊，而循環于亥子初無異。至其後人之傳教，推步益臻於神妙。帝乃命以欽天。紀官司于鳳鳥；易刻漏以茲鐘，建靈臺于雲表。

順治二年（1645），清廷頒布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編纂的《時憲曆》，是清朝使用西方曆法的開端。雖然曾一度中斷於順治末至康熙初年的中西曆法之爭，但在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努力抗辯下，康熙八年（1669）終究回復使用西洋曆法。<sup>67</sup>康熙十三年（1674）南懷仁新造《儀象志》告成，當中即

<sup>64</sup> 《初學記》引梁《漏刻經》曰：「漏刻之作，蓋肇於軒轅之日，宣乎夏商之代。」參見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25，頁 595。

<sup>65</sup> 《黃帝內經靈樞》〈九鍼論〉載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數焉，以鍼應數也。」將樂律與鍼數合論。可能因為皆與黃帝有關，納蘭性德因而混用了上文引及的黃帝命伶倫取嶰竹造十二律的典故，故仍以伶倫釋之。參見舊題明·朱震亨，《脈訣指掌病式圖說》（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3。

<sup>66</sup> 《周禮》〈夏官·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柝。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參見《周禮正義》，卷五十八，頁 2415-2420。孫詒讓引《詩經》〈齊風·東方未明〉毛傳：「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曰：「則平時此官兼掌告時，與雞人為官聯。」

<sup>67</sup> 這段歷史研究成果頗多，大致發展可參見黃一農，〈湯若望與清初西曆之正統化〉，收入吳佳麗、葉鴻灑主編，《新編中國科技史》（臺北：銀禾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 465-490；徐海松，《清初士人與西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第一章，頁 21-52；第三章，頁 83-120。

有擺錘計時的紀錄。<sup>68</sup>納蘭性德用《尚書》〈說命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來歌頌皇帝「法天以立教」<sup>69</sup>，也巧妙引入以此典為名的《時憲曆》。敘述完康熙任命為欽天監的南懷仁以自鳴鐘取代漏壺後，他依然同時盛讚西洋曆法與自鳴鐘計時，如言其「抉宣夜之淵弘，殫周髀之浩渺」，超越傳統天學的宣夜說與蓋天說後，又曰：

於以範圍歲月，統章而無乖；消息寒暑，晦朔而勿爽。此其造曆之密，不徒與太初麟德為頡頏；製作之精，非僅同弘度承天相揖讓。知自此楓庭萸莢，可勿生堦；彤陛雞人，無煩戴絳。

《時憲曆》與自鳴鐘，相對於漢代的《太初曆》、唐代的《麟德曆》，以及李充、何承天所描述的漏刻與渾儀，<sup>70</sup>計時之精密無訛皆不遜色半分，因而也不再需要代表祥瑞的萸莢依時生落，<sup>71</sup>或是戴著絳幘的雞人早晨傳唱。最後則盛讚道：「洵足媲銅儀玉簫，垂為典則而難改；且可配大撓章亥，祀之奕世而常新。迨將黜公輸而褫子野，夫何周禮臯氏之足云。」既說自鳴鐘有如銅儀、玉簫、創造甲子的大撓<sup>72</sup>與推步東西南北里數的大章、豎亥<sup>73</sup>般值得歷代景仰，但又說其勝過公輸班或師曠<sup>74</sup>，

<sup>68</sup> 參見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四十三，志二十，時憲一，頁1666。

<sup>69</sup> 《尚書正義》，卷十，頁140。

<sup>70</sup> 此典應是出自陸倕〈新漏刻銘〉「弘度遺篇，承天垂旨」，李善注：「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由於何承天曾以渾天儀論天體，故以渾天儀釋之。參見《文選》，卷五十六，頁791；梁·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二十三，志第十三，〈天文一〉，頁677。

<sup>71</sup> 典出《竹書紀年》〈帝堯陶唐氏〉：「又有草莢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萸莢』，一曰『曆莢』。」引自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收入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上，頁208。

<sup>72</sup> 《呂氏春秋》〈尊師〉：「黃帝師大撓。」高誘注：「大撓作甲子。」參見《呂氏春秋集釋》，卷四，頁91。

<sup>73</sup> 《淮南子》〈地形訓〉：「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

也無須再提及《周禮》中鑄鐘的鳧氏。<sup>75</sup>既將之上比為歷時不衰的經典或偉人，由此認可過去的「常新」，又不避諱西洋曆法與自鳴鐘超越傳統曆法與計時器，雖然已有「法依古里」、「而循環于亥子初無異」等句緩頰，似乎仍容易給人西洋新法與奇器勝過中國傳統的印象，兩者之間隱然有所矛盾，但是這仍是在「聖祖龍興，造邦中宇」之下被採納，因而仍未呈現什麼焦慮感。<sup>76</sup>

其他的〈自鳴鐘賦〉，大多如納蘭性德之作清楚寫出自鳴鐘源自西方，精巧勝過中國傳統所有，如胡長齡賦：「誰知浮海而來，自有推時之器。創線輪於表內，本出歐羅；縮靈憲於圓中，坐窺日至。……非陸倕之曾銘，抑一行所未記。」<sup>77</sup>認為這是過去沒有被鄭重書寫過的「推時之器」。此外，還特別強調自鳴鐘是「經重洋而來譯，仰聖澤之遠覃。協青雲之上瑞，合朱草之美談」，突出其為歐洲各國遠渡重洋而來的貢物，彷彿是昭示帝德遠播的祥瑞。胡積城賦也謂：「既倕作之不如，亦禹銘之何必。」在他看來，自鳴鐘超越了陸倕〈新漏刻銘〉與相傳大禹所作，與鐘相關的〈箕箒銘〉<sup>78</sup>，又在賦末歌曰：「物巧兮知時，寸晷

---

十五步。」參見張雙隸撰：《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卷四，頁431。

<sup>74</sup> 師曠以知音善琴著稱，大抵是因此特質與同樣常被聯想為樂器的自鳴鐘相提並論。師曠字子野，見《抱朴子內篇》〈辨問〉：「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參見東晉·郭璞著，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十二，頁225。

<sup>75</sup> 《周禮》〈考工記·鳧氏〉：「鳧氏為鍾。」參見《周禮正義》，卷78，頁3259。

<sup>76</sup> 納蘭性德在其《淶水亭雜識》中也稱道「西人曆法實出郭守敬上，中國曾未有也」，參見清·納蘭性德著，黃曙輝、印曉峰點校，《通志堂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卷十六，頁305。

<sup>77</sup> 陸倕曾作〈新漏刻銘〉歌詠漏刻，收於《文選》，卷五十六，頁790-793；一行（683-727），唐代著名天文學家，曾與梁令瓚一同設計渾天儀，其上疏曾略為回顧漢代以來渾儀的演變，參見五代·劉昫等著，《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三十五，志第十五，〈天文上〉，頁1294-1295。

<sup>78</sup> 典出《鬻子》〈禹政〉：「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為銘於筭箒，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參見鍾肇鵬撰，

驗兮無虧。流行海內兮，創自西陲。洩乾坤之祕兮，發造化之奇。」即使天地造化的奧秘被創自西方的巧物揭露，似乎是件值得驚嘆，而非疑慮的事情。到了已能本土製造自鳴鐘的晚清，王廣焱還是說：「溯西僧之儀器，傳寶製於神工。」賦末曰：「不必銅儀以定候，無煩銀箭以知更。問夜如何，奚事聽夫金鑰；以時而發，實遠勝乎璣衡。」仍然在表彰自鳴鐘勝過銅儀、漏刻、璣衡等傳統天文、測時儀器的殊勝。

這些賦作中，唯一較明顯帶有「中學西源」色彩，反倒是創作時間較晚的郎葆辰賦。其賦開篇即言「自鳴鐘者，郭守敬之遺法焉」，認為此即郭守敬（1231-1316）製造的燈漏之遺法，<sup>79</sup>又說「法渾象於張衡，笑談天之鄒衍」，一方面認為是取法張衡的渾天儀，但又說已勝過以談天著稱的鄒衍，其後更言其「鑄不煩夫堯氏，掌何賴乎后夔」<sup>80</sup>，可見他在比附中國傳統固已有之之餘，<sup>81</sup>還是稱讚自鳴鐘的卓越勝過往昔。

跨越清初至清末，書寫模式卻是如此一致，自不能解釋成作者們對於自鳴鐘的實際認識絲毫不變，也未必是他們渾然不覺新物與舊傳統的殊異，而是因應頌美新事物的創作動機與賦體書寫模式，因此既強調其出自西方的新異成份，又仰賴典實裝飾予以定位。

《鬻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7。

<sup>79</sup> 元·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曰：「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參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第二十六冊，卷六百七十九，頁760。

<sup>80</sup> 夔為舜時樂官，見《尚書正義》，卷三，〈舜典〉，頁46。

<sup>81</sup> 張衡的渾天儀與郭守敬的燈漏都需要用水推動，如燈漏：「次為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鑿鳴以應於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鐃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鐃，初正皆如是。」看來頗似自鳴鐘的報時功能，不過燈漏仍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之」。參見東漢·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收於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五，頁595-596；《元史》，卷四十八，志第一，〈天文一〉，頁994-995。

## (二) 以賦為頌與勸百諷一

上文所述賦作對於自鳴鐘多屬毫不保留的讚頌，唯一對自鳴鐘流露一絲疑慮的，是劉鳳誥之作，恰好其相關段落，與同時創作的汪廷珍賦皆位於末段，因而放在一起討論。汪廷珍賦開篇言：「繫泰西之儀器，本疇人之妙矩。運巧心于微渺，軼佳制於往古。」清楚點出此賦就是要歌頌西方自鳴鐘超過往古的傑出，如：

彼夫挈壺著于周官，刻漏掌諸太史。更傳銀箭，催殘耿耿之宵；水滴銅龍，驗到遲遲之晷。然而寒暑或爽其經，燥濕或殊其軌。何如此之運行不假于人為，永短一隨乎天紀。觸而斯發，有如風之過簫；響以應聲，不啻臂之使指。

他先敘述古代以漏刻計時，但由於寒暑日夜長度不同，需要調整漏刻箭數，燥濕有異也會使水流流速不一，對比出自鳴鐘更隨天道運行、應聲，一如其他〈自鳴鐘賦〉之以體現天道頌美之。在賦的結尾，汪廷珍歌頌筆觸更延伸至當朝皇帝：

我皇上健行不息，逸豫無耽，帳殿披章，月華半吐；璇宮問夜，暝色猶含。惟是鐘之致用，與璣衡而相參。何處冬生，邀天章之特詠；不須水沃，極人巧而無慚。于以佐勉勉于朝辰，無荒無怠；不遠勝奏欽欽于水上，以雅以南也哉？

在此段中，他將自鳴鐘的「用」定位在使乾隆不耽於逸豫的批閱奏章，並問夜之早晚的勤政美德<sup>82</sup>，彷彿與天道同樣健行不息，因此能夠輔佐君主不懈怠的自鳴鐘遠勝於不合於禮、奏於淮水之上的鼓鍾之樂。<sup>83</sup>其

<sup>82</sup> 「問夜」兩句應是暗用《詩經》〈小雅·庭燎〉「夜如何其」之問，鄭玄注曰：「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參見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詩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十三經注疏本），卷十一，頁374。

<sup>83</sup> 典出《詩經》〈小雅·鼓鍾〉：「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關於此詩之意，毛傳與鄭箋不同，前者認為此段是書寫正樂以諷刺幽王奏淫樂，後者認為此段是書寫幽王奏正樂於淮水之上，

中，「無荒無怠」出自《尚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sup>84</sup>原意是要勸勉舜謹守法度，不要耽溺逸樂、怠惰荒廢，方能使四夷之國歸之，此則轉應然之勸為實然之頌，彰顯乾隆之勤於政事。更特別的是，「何處冬生，邀天章之特詠；不須水沃，極人巧而無慚」典出自乾隆〈生冬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詩韻〉之十七：

何處生冬早，冬生洋表中。時辰表來自西洋，每日上弦一次，晝夜周行隨大小針所指以定時刻分數，寒暑無異。來知經大海，運不畏寒風。爨火猶嫌拙，《周禮》〈夏官·挈壺氏〉：「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今洋表雖冬寒不凍，無藉爨沃之勞，其法為更精耳。沸湯空自融。人工奪天巧，沃漏愧神叢。<sup>85</sup>

乾隆本人十分喜愛西方鐘錶，其時清宮鐘錶製作的成就與進貢、收藏也達到高峰。<sup>86</sup>此詩表彰冬日的洋表不受寒暑影響，尤其與漏壺在冬天水凍，需用沸水灌之相比，更加巧奪天工，自然能反映其對自鳴鐘的鍾愛。除此詩外，乾隆尚有〈自鳴鐘〉一詩曰：「扶桑日出海門紅，大秦西洋颺景風。懸撞度索底貢同，於皇聲教敷天通。……梯航山海來朝宗，厥獻奇物自鳴鐘。應時滴響聲春容，挈壺無所施其功。」<sup>87</sup>〈詠自鳴鐘〉：「奇珍來海舶，精製勝宮蓮。……抱箭金徒愧，挈壺銅史捐。」<sup>88</sup>等等，都是稱美來自海外進貢的自鳴鐘效用卓著，勝過往昔。汪廷珍結合故實（《周禮》對挈壺的記載）與今典（御製詩），想來應會達到極佳的歌頌效果。

是所奏之處失禮。參見《詩經正義》，卷十三，頁452。

<sup>84</sup> 《尚書正義》，卷四，頁53。

<sup>85</sup> 參見清·乾隆，《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千三百零七冊，卷八，頁23a-23b。

<sup>86</sup> 參見李侑儒，《明清的鐘錶（1582-1911）》，第一章，頁16-23。

<sup>87</sup> 參見清·清高宗御製，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千三百冊，卷十四，頁13b-14a。

<sup>88</sup> 清·清高宗御製，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三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千三百零六冊，卷八十九，頁24b-25a。



劉鳳誥賦則略有差異。雖然前大半段一樣突顯「於時利瑪初投，歐羅遠造」、「十二梵字一圍」的自鳴鐘勝過往昔計時之器，如「問鷄人而屢報，箭任投壺；傲鳧氏之多能，鐘非按譜」，「彼絜短絜長，笑土圭之側影」，或認為其能「娛坐客之清喧，誇海人之絕技」等等。不過在最後一段，似乎擔心太過誇讚自鳴鐘，而出現了弦外之音：

則有朝臣履集，學士詞探。鏡啟鼇扉，傳未央之晝永；珠霏鴛鴦，遞長樂之風酣。何如天子求衣，時柄甄於斗北；日官典刻，辰籌唱以司南。此滿袖香煙，快聽雲門之奏；而諸蠻錦罽，不矜海市之談者也。

末段先敘述朝臣學士上朝，鐘聲繚繞的華貴氣象，歌頌朝堂中天子勤政而權柄集中在上，日官主掌計刻、報時而使人臣有所依歸。其後話鋒一轉，指出與代表古樂正統的〈雲門〉之奏<sup>89</sup>（應是為了配合自鳴鐘之鳴音）相比，海外蠻夷所貢的器物就不值得矜誇了。此時，華夷的界線便被劃出，再是「絕技」也終究要讓位，既是曲終奏雅，也有在清朝館課賦中難得一見的寓諷於頌（儘管就比例而言是「勸百諷一」）。

不過，同樣是乾隆的詩，也有跟上文所引看起來互相矛盾，反與此賦相似的聲音，如〈曉〉：「寧藉自鳴鐘，偷天炫人巧。」<sup>90</sup>同樣是「天」、「巧」，但「偷」、「炫」顯然是偏向負面的觀感，又如〈御製壺漏銘〉反而稱道壺漏考時精準，「器與道偕」，「較自鳴鐘，淫巧徒傳」<sup>91</sup>，看來乾隆在傾心於自鳴鐘的神異、準確之時，畢竟對於其異國來歷不能無視，因此以詩表達譏刺、警戒之意（雖然與其上引詩作與實際上大量收集鐘錶的作為都互相矛盾）。可能也正是因此，劉鳳誥賦在頌美自鳴

<sup>89</sup>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周禮正義》，卷四十二，頁 1725。

<sup>90</sup> 《御製詩三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千三百零六冊，卷九十五，頁 32b。

<sup>91</sup> 清·清高宗御製，清·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千三百零一冊，初集，卷二十七，頁 3b-4a。

鐘之餘，最後仍要點到「不矜海市之談」——由於該賦創作的場合是翰林考課，似也以點到為止為宜。

綜上所述，清代對於自鳴鐘的考述，從一開始以「中學西源」說為主流，到晚清漸漸開始較為準確的介紹歐洲自鳴鐘發明的歷史，似乎有較為穩定的發展。反觀清代〈自鳴鐘賦〉的描寫，並未隨創作時代漸晚而呈現逐步的變化。除了郎葆辰賦之外，其他賦作大多直接寫出自鳴鐘源自西方傳教士引進；除了劉鳳誥賦在最後稍稍表露了夷夏之防之外，納西方新物為己用並不成為問題。此外，即使自鳴鐘至清代中後期，對士人應當不再是未知新物，賦中仍多強調其西來、新異身分，大抵由於這類辭賦多以頌美為主調，而非嚴格的考釋，如此應該有助於使讀者更感興趣，甚且成為歌頌君主恩澤遍布、萬國來朝的著力點，而不致引發反感或疑慮。

此外，這些賦作大多帶入計時器乃至於曆法測算的歷史，以突顯自鳴鐘超過過去的漏壺、土圭等，除了是賦家使事用典以展現博學的慣技之外，更凸顯賦體的預設——所賦之物即使來自西方，並未與中國傳統有絕對的斷裂，比如雖然眾人賦中多強調自鳴鐘勝過漏壺，但也未著眼運作原理的殊異（機械與水力）。既然賦中的自鳴鐘依然籠罩在傳統的天道觀與時間觀中，即使器勝過往昔，道既不變，那就依然處在連續的發展中，終究沒有脫離理解與書寫傳統的可能範圍。至於自鳴鐘與其背後挾帶的不同時間觀，不免也在這些跨越時空的類聚典故之過程中被稀釋掉了。

#### 四、結論

根據過往研究成果，可以發現自鳴鐘並不只是來自西方、更加精準的計時器，也與西方現代時間觀的傳播息息相關。當其於明末傳入中國，也漸漸改變中國傳統的時間觀。然而，若關注傳統文體如何書寫自

鳴鐘，相對於一般的記載、考述，傳統文體背後的框架將更為清晰。尤其相對於詩，賦既有足夠篇幅大肆書寫，又有使事用典的特色，其彰顯與遮蔽之處更為突出。本文關照清代〈自鳴鐘賦〉如何書寫此一西方器物，便以賦體善於類聚典故的書寫角度出發，著重指出兩點：

（一）自鳴鐘本來與西方現代時間觀的機械化、標準化、線性發展、脫離實際天象、人事經驗等特色互為因果，而在清代〈自鳴鐘賦〉中，更常聯繫到「人巧」背後的「天工」，彰顯的是中國傳統氣類感應、循環往返、與具體天象、人事密切相關的時間觀。

（二）可能是為了突出其新異，即使隨著時代演變，中土已能自行製造自鳴鐘，也未必只是宮殿中方能得見的奇器，〈自鳴鐘賦〉仍多強調其作為西方新物的身分，且不避諱書寫其效用勝過中國傳統的計時器，同時又常常將之放在中國計時器以至於曆法測算的歷史脈絡，當中可能有的矛盾，便被一片歌頌詞句掩蓋過去了。

面對此一「豈有專門典故」的西方新事物，清代士人仍有辦法運用、類推傳統上手的典故予以賦形，例如透過自鳴鐘的指針與圓面體現天道循環、從字面上的「鳴」與「鐘」聯想傳統律曆合論之學或作為報時的各式撞鐘等等，他們並非不知當中實有差異，然而誠如鄭毓瑜指出，賦體前身的類聚模式，更重要的是「說（寫）、聽（讀）雙方，如何可能建立對於龐大類推或組織的熟悉度」，因而「類聚眾物，在使用上，並不要求一一對應，並非為了促成替代作用，也因此不需要進行明顯的揀選或切割，反而極盡所能地呈現」<sup>92</sup>。因此，〈自鳴鐘賦〉的書寫，是以自鳴鐘為節點，輻散出種種可能類推、可以相應的經史掌故，當然也包含了其背後不言而喻的，順天從時的秩序與價值，想來能夠符合帝王或考官的預期。至於自鳴鐘的運轉原理或機輪指針等細節，既不能，也不必被放到此一文體框架。因此，從清初到清末的〈自鳴鐘賦〉，雖然

<sup>92</sup> 鄭毓瑜，〈替代與類推〉，《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第四章，頁 217。

寫的是新事物，寫作模式與預期讀者皆一如傳統，因此大體而言並沒有使傳統賦體走出新境界。

因應〈自鳴鐘賦〉中大量的徵聚典故，本文多處理其典故運用與自鳴鐘本身形制與其背後的時間觀之間的相近或疏離。事實上，使事用典作為中國文學傳統，本身也是中國傳統時間觀的具體呈現。蔡英俊便指出魏晉以降使用典故不再只是單純的修辭手法，更重要的是「在言談或書寫的活動中能透過對於既往的事例的借用與解釋來證顯當下的經驗」<sup>93</sup>。可見這種手法之所以成立，即是基於這種時間思維與感知模式，過去、現在與未來，在線性時間中界限分明，在傳統時間思維與使事用典手法中就幾乎被弭平了。<sup>94</sup>

當此一手法與文體長久以來被反覆習練、操作，即使思維與感知模式受到西力的挑戰而逐漸瓦解，一時之間仍找不到一個相應的新的書寫模式，以至於很難斷然放棄。若以文言、白話文學對立，而後者淘汰前者的文學史觀去觀照，自然只能得出其了無新意、必然被時代洪流沖刷殆盡的結論<sup>95</sup>；然而，即使辭賦已非當代歌詠新事物的慣用文體，若從過去舊文體書寫新事物當中的新舊混雜之拉鋸地帶來切入，可能更能看

<sup>93</sup> 參見蔡英俊，〈「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 86。

<sup>94</sup> 黃俊傑指出，古代中國的時間觀充滿了人文意涵，往往是透過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或先聖先賢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往返運動，並透過古今對比進行意義創造，批判「現在」或引導「未來」，因而「過去」、「現在」與「未來」呈現有機式的交互滲透。參見黃俊傑，〈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與運用〉，《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第三部第三章，頁 90-105。

<sup>95</sup> 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總結清賦衰弱的五「窮」：時序、體式、風格、資養、文詞，大體上是集大成而少創新，並且連結上封建社會崩潰，文言文衰歇，以及白話新文學興起的文學史論述，顯然是以五四的新變鑄就了新舊二元的論述。若同時觀照當中的變與不變、發展與延續，也許能更加深入討論那些觸及新事物、新觀念的辭賦。參見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頁 769-771。

到舊的感知、類聚、書寫模式試圖伸縮適應，或是最終力有未逮的地方，由此映照舊文體之寸短尺長，或許是更有意義的研究路徑。<sup>96</sup>

---

<sup>96</sup> 晚清民初的報刊中也刊登不少書寫新事物的辭賦，由於讀者與作者皆已不再僅限於廟堂之上，因而文體規範也展現出更大的轉變，比如梁淑媛對〈輕氣球賦〉的分析，指出此賦已由傳統尊榮帝王的歌功頌德轉變為以人民日常生活的娛樂感受、異人的創發精神與未來的烏托邦等內涵。本文與之對照，適可發現清代〈自鳴鐘賦〉尚在傳統賦體的範圍內。賦體內外之間，尚有許多議題可談，筆者將另文探討。

## 主要徵引書目

### 一、傳統論著

-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
-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鍾肇鵬，《鬻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0。
- 〔戰國〕呂不韋撰，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臺北：華正書局，1988。
- 《黃帝內經靈樞》，北京：中華書局，1991。
- 〔西漢〕劉安撰，張雙隸撰，《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臺北：王記書坊，1984。
-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十三經注疏本。
- 〔東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8。
-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詩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十三經注疏本。
- 〔東漢〕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東晉〕郭璞著，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東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李學勤等編，《爾雅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1。
- 〔梁〕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藏版。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中華書局，1999。

- 〔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舊題〔明〕朱震亨，《脈訣指掌病式圖說》，北京：中華書局，1991，  
《叢書集成初編》本。
- 〔清〕清聖祖御製，清·張玉書、清·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  
文二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9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6。
- 〔清〕納蘭性德著，黃曙輝、印曉峰點校，《通志堂集》，上海：華東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清〕陳元龍編，《歷代賦彙》，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影印光緒  
年間雙梧書屋俞樾校本。
- 〔清〕沈大成，《學福齋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28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
- 〔清〕清高宗御製，〔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清高宗御製，〔清〕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收於《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清高宗御製，〔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三集》，收於《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清高宗御製，〔清〕梁國治等奉敕編，《御製詩四集》，《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汪廷珍，《實事求是齋遺藁》，《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50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阮元著，鄧經元點校，《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 〔清〕周壽昌撰，許逸民點校，《思益堂日札》，長沙：岳麓書社，1985。
- 〔清〕任聘三纂注，《律賦律青詳註》，道光元年合新堂藏板。
- 〔清〕劉熙載，《藝概》，臺北：華正書局，1988。

- 〔清〕鴻寶齋主人，《賦海大觀》，北京：北京圖書館，2007。
- 〔清〕王廣焱，《復廬賦集》，林慶彰主編：《民國文集叢刊》第一編，臺中：文听閣圖書，2008。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 〔美〕羅伯特·列文（Robert Levine）著，范東生、許俊農等譯，《時間地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
- 〔法〕路易·加迪（Louis Gardet）等著，鄭樂平、胡建平譯，《文化與時間》，臺北：淑馨出版社，1992。
- 王煒編校，《〈清實錄〉科學史料匯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 江曉原，《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 吳國盛，《時間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呂妙芬，《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1979。
-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徐海松，《清初士人與西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 馬積高主編，《歷代辭賦總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
- 曹明綱，《賦學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 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
-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 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 詹杭倫，《清代賦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 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 蔣南華，《中華傳統天文曆術》，長沙：海南出版社，1996。
-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 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
- 簡宗梧，《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 （二）期刊論文

- 別廷峰，〈歌頌進步 意寓改革——讀納蘭性德的《自鳴鐘賦》〉，《承德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9），頁83-86。
- 林素娟，〈漢代感生神話所傳達的宇宙觀及其在政教上的意義〉，《成大中文學報》第28期（2010.4），頁35-82。
- 俞士玲，〈論清代科舉中辭賦的地位與作用〉，《學術月刊》第3期（2000），頁76-81。
- 梁淑媛，〈飛向星星的你（sic itur ad astra）：一個跨文化賦作〈輕氣球賦〉的遊樂園意涵考察〉，《中國學術年刊》第38期（2016.9），頁83-114。
- 章啟群，〈《漢書·律曆志》與秦漢天人思想——以音樂思想為中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2），頁8-15。
- 黃一農，〈湯若望與清初西曆之正統化〉，收入吳佳麗、葉鴻瀾主編：《新編中國科技史》（台北：銀禾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465-490。
- 黃一農、張志誠，〈中國傳統候氣說的演進與衰頹〉，《清華學報》新第23卷2期（1993.6），頁125-147。
- 詹杭倫，〈杜甫詩與清代書院詩賦試題〉，《杜甫研究學刊》第71期（2002），頁87-100。

- 廖肇亨，〈清代中葉詩歌之世界圖像探析〉，《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頁283-316。
- 趙秀亭、馮統一，〈納蘭性德行年錄〉，《承德民族師專學報》第20卷第4期（2000.11），頁13-21。
- 劉曉東，〈義和意象的緣起與演變〉，《齊齊哈爾工程學院學報》第5卷第2期（2011.6），頁78-81。
- 潘務正，〈法式善《同館賦鈔》與清代翰林院律賦考試〉，《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4期（2006），頁100-107。
- 蔡英俊，〈「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67-96。
- 簡宗梧，〈賦的可變基因與其突變—兼論賦體蛻變之分期〉，《逢甲中文學報》第12期（2006.6），頁1-26。
- 簡宗梧，〈賦體之典律作品及其因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6期（2003.5），頁1-28。

### （三）會議論文

- 劉怡伶，〈《申報》所載竹枝詞中的現代性體驗——以「自鳴鐘」題材為例〉，《國際圖書館東亞文獻合作暨華文報刊數位化研討會學術論文集》，長沙：湖南長沙人民政府、中國研究圖書館員學會（北美）、歐洲漢學圖書館員協會、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東亞部、青蘋果數據中心等合辦，2010。頁290-298。

### （四）學位論文

- 李侑儒，《明清的鐘錶（1582-1911）》，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梅政清，《中國上古天文學之社會文化意涵》，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g, Yu-Yu. *Gesture and Language*, Taipei: Rye Field Publications, 2017.
- Cheng, Yu-Yu. *Yin Pi Lian Lei: Wen Xue Yan Jiu De Guan Jian Ci* [Categorical Association: The Keywor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aipei: Linking, 2012.
- Huang, Yi-Long.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and the western calendar's legitimism in early Qing dynasty." *New edited Chinese Technology History* (Wu J.-L., Ye H.-S. Ed.). Taipei: Yin He Culture Company, 1990, pp.465-490.
- Li, You-Ru. *Ming Qing De zhong biao* [Clocks and watches in Ming-Qing period (1582-1911)].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istory doctoral, 2010.
- Liang, Shu-yuan. "Flying to the Stars : A Cross-Cultural Rhapsody 'Hot Air Balloon Fu' Playground Meaning" *Studies in Sinology*, Vol.38 (Autumn), 2016, pp.83-114.
- Louis Gardet. Ed. *Wen Hua Yu Shi Jian* [Culture and Time].(Zheng L. P., Hu J. P. Trans.) Taipei: Shu Xin Publishing House, 1992.
- Ma, Ji-Gao. Ed. *Li Dai Ci Fu Zong Hui* [Ancient Fu Sylloge]. Chang 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4.
- Robert Levine. *Shi Jian Di Tu* [A Geography of Time]. (Fan D. Sh, X J.-Z., Trans.)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 Wu, Guo-Sheng. *Shi Jian De Guan Nian* [The Concept of Tim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6.
- Zan, Xiao-Bai. *Shi Jian De She Hui Wen Hua Shi: Jin Dai Zhong Guo Shi Jian Zhi Du Yu Guan Nian Bian Qian* [Socioculture History of Time: a Study on Changes on time systems and concepts in Modern China].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13.

**Transform the Technic into Nature and Tao,  
and the New Things Exceed the Traditional Things :  
The Pattern of the Writing in the Series  
of *The Fu of Describing Chime Clock* in Qing Dynasty**

Sheng Hui You\*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especially by the Fu of describing things, which needs to gather many literary quotations, in that how to write new and foreign things by the traditional genres in old epitomes in China.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eries of *The Fu of Describing Chime Clock*, many of which was written becaus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writings of *The Fu of Describing Chime Clock* usually includes two parts: 1. The authors of the series always expressed “technic” in chime clock by “nature” and “Tao” in Chinese tradition, and quoted many knowledge and allusions to Yin Yang in Chi and associated thinking. 2. The authors of the series expressed that the chime clocks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were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clocks in China. However, they tried to claim that chime clocks have little difference from the traditional clock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time in China, and it seemed to reduce the anxiety to the West. In summary, the authors tried to describe new things by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genres of associated thinking. There are some innovative ideas of the theme, but some shortcomings are considered.

Keywords: Qing Dynasty, The west, chime clocks, Fu, New things

---

\*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